

airiti
臺灣社會學刊 第二十一期
1998年10月頁89-129

現代性與風險社會

周桂田*

*慕尼黑大學社會系博士班

中文摘要

本文主軸以典範轉移的角度－風險社會學－闡析現代性之正當性危機，特別是在高科技發展下，現代社會秩序和行動的危機。其分為下述五個討論重點：

首先為價值面向，討論從工業社會之線性（目的）理性邏輯至風險社會「反身性」邏輯之轉轍。其次為系統面向，指出由於政治、經濟系統獨大的支配，與在此機制下科技（學）系統盲目樂觀的發展，陡增當代社會行動者的「風險意識」。

第三為人與自然的關係面向，分析傳統「社會」與「自然」對立關係之解消，在風險結構下，（個）人、社會和自然三者被逼迫（建構）為直接而等等的生存體系。第四為制度的面向，批判科技官僚及科技代議權力之缺失，並以商議民主式的公民社會觀點，提出「科技公民權」的社會參與意義。第五為社會認同面向，討論社會行動者所面臨「風險自由」的抉擇難題。

關鍵詞：風險社會、反身性現代化、社會系統、風險意識、科技權力的代議結構

一、前言

有關現代性 (Modernität, Modernity) 這個論題的討論，在社會哲學及社會學上有其理論的關連性。在十七與十八世紀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及黑格爾針對「社會契約」概念，或是體系性的建構，或是體系性的批判，而浸淫於對現在社會體制及精神的思考。十九世紀工業社會逐漸發展，馬克斯、涂爾幹、韋伯及齊美爾分別從勞動、資本、階級、理性化及整合的觀點，闡析現代性的問題。這些傳統的概念模組，如契約／勞動、行動／階級與國家／社會等，曾主導人們對現代社會的分析，成為主要的顯學。但在二十世紀末，因科技高度的發展及現代社會高度複雜的功能分化，使得社會科學舊有的思考機制受到強烈的挑戰，甚至喪失了他們詮釋能力的整全性和圓滿性。因此，一個結合於分析當代社會由於知識、科技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系統複雜分化及其危險之社會理論：風險社會學 (Soziologie des Risikos)，就逐漸登場 (Bechmann 1993)。

本文試圖從「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 這個概念為主軸，以文化社會學的角度分析現代社會制度、秩序、心理及生態(人類、環境)之危機。自第二節開始，本文將討論風險作為社會理論的建構基礎，及其成為當代議題核心之意義。第三節中，我們將在總體上掌握風險、社會秩序與現代性的關聯，筆者將以貝克 (Ulrich Beck) 所建構的「反身性現代化理論」(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Beck 1986; 1993a) 為切入點，探討西方社會自啟蒙運動以來，以如瑪克斯·韋伯目的式的單線理性 (Lineare Rationalität) 為基礎所展開的現代化工程架構，在人類生態及環境危機日益惡化的危機中，顯得搖搖欲墜的現象。尤其科技對社會生態的衝擊，根本上動搖了人類對社會規範、價值及秩序信仰的基礎。

這構成了現代性的危機。因此，在第四節中我們將探討現代性中的風險結構，4.1節集中在社會分化的結構的複雜性與風險的意義；4.2節將分析在當代高度的生態破壞危機中，自然對社會的關係；4.3節將進行在現代社會科學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過程中，「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在科技政策決定流程中的鬥爭，尤其是科技官僚在當代的無能，與「社會契約性」（*Sozialverträglichkeit*）意義下之科技政策或者「科技公民權」（*Technologische Citizenship*）的興起。我們也將闡析在風險社會人們如何透過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kratie*, Habermas 1994）---反省討論的程序，來對抗長久以來專家統治的危機，為現代社會找到新的出路。

一般而言，除了上述現代科技帶來全球性的環境生態危機外，風險社會的另一個意涵即是人類生態的危機：科技進步導致社會分工及社會行動條件的改變，更進一步衝擊到人們原先社會認同的基礎，而產生「個人主義化」（*Individualisierung*）的危機。在第五節中，我們就將這個課題加以申論。

二、「風險」之問題意識

何謂「風險」？何謂「風險社會」？他們在社會學上如何被建構起來？具體而言，他們如何與當代的社會形態、體制及社會行動條件關連起來？做為一般的理解，風險被認為是一個未來的不確定的、充滿危險的可能（*Bonß 1991*）。它基本上是時間及空間取向的。相對的，風險這個概念作為社會學上之問題意識以及其作為理念型的思考，同時是被連結到當代工業社會的危機面向。當代工業社會的發展，由於科技的進步逐漸的進入了後工業社會時期（*Bell 1975*）。但也由於科技發展的高度複雜性和不可控制性，以及層出

不窮的重大災變，如美國三哩島及前蘇聯車諾比爾核災事變，帶給人們新的恐懼和反省。也鑑於此，1991年於里約召開的全球生態會議，即提出了「永續發展」的精神。在社會學上，對科技、科學的發展與對科學理性的質疑，即逐漸成為人們對現代化過程的反省的一個關鍵議題。我們可以說，風險議題已成為現代性思考的核心之一。所謂風險社會即是現代社會（Beck 1986；Luhmann 1995）。社會學家們探討科技進步和其帶來的風險如何改變社會功能系統的分化、制度的設計，影響人類日常生活的行動條件、心理結構和行為取向。更根本的是，人類如何在現代社會面對自我與社會認同。

對風險和風險社會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理解。斐洛（Perrow 1988（1984））在其提出的「常態之意外」（Normale Katastrophen）見解中，認為現代科技的系統，無論是安全的計算性上或危險的控制性上，皆預測了高度風險性的存在。也就是現代科技管理系統無法不直接、間接承認風險的不可控制性。他批評傳統上對於意外災害的解釋局限於操做條件的錯誤，而不去正視「易產生風險之系統的結構分析」（Strukturanalyse risikofälliger Systeme）。因此，他主張去設定一個長期的風險管理策略。我們可以同意，風險研究是對現代性理解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風險（尤其是科技風險，如核能風險、基因科技風險及資訊科技風險¹所帶來的生態、經濟與社會的損失。）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人類日常生活已由於科技化而大量改變其型態，風險因此經常的滲入了人與科技的互動之中，

¹ 由基因科技所生產的產品，在資本主義商品化的推波助瀾下，不但造成消費市場秩序改變的攻防戰，也引起大眾的疑慮。如最近由美國所生產的基因豆芽及其粉末已確定輸入歐洲共同體市場，此舉引起當的民眾一陣恐慌。關於對基因科技產品的社會學研究可參考 Beck-Gernsheim (Hrsg.)，1995。對於由資訊科技所造成資料傳輸或計算上的重大錯誤及損失，可參考 Weißbach, H & Poy, Andrea (Hrsg.)，1993。

成為人們思考現代秩序及意義不可忽略的一環（Douglas & Wildsky, 1982）。

而在當代複雜變動的風險社會中，傳統形上學的說理及範疇已失去其詮釋的功能，人們必須再找出符合社會演化或革命性變動的社會理論，提出一套從這個社會事實勾勒出來的問題意識和科學建構。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風險理論本身是一項當代科學的建構。德國社會學家貝克在80年代中期首先體系性的提出對風險社會學嘗試性的建構（Bechmann 1993）。隨後，魯曼（Luhmann 1995）從科學和社會系統分化的關聯性解析風險社會的意義。紀登思（Giddens 1990; 1994）則從專家統治的弔詭性切入現代性與風險的關係²。

從現代化發展為出發點，貝克宣稱自傳統社會過渡到工業革命演化以來的現代化過程為「簡單的現代化」（Einfache Modernisierung），而當代工業社會的（再）現代化過程則為「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進一步說，前者意謂傳統、前現代社會經由工業社會解消與取代；後者則是工業社會經由另一個新的現代形式而解消與取代，也就是由工業社會所自我衍生的危險（人文、環境生態的危險）逼迫它自身必須面臨激進的自我批判、自我改變，進而再過渡到一個新的現代。貝克所關心的是，舊有的工業社會秩序如何被新的社會形式取代，而新的社會秩序如何可能（產生）的問題。他在86年《風險社會》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現代科技所牽動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形式的改變才是關鍵。因此他主張，社會學傳統的典範已不敷使用，如功能學派、

² 「風險社會」議題在九〇年代逐漸受到社會學界的重視，其探討的課題除了環境危機之外，也從不同制度面、價值面及社會面（生產、秩序）進行對現代社會作為風險社會的分析。關於風險研究的源起、概念及社會分析，可參考Bechmann, G (Hrsg.), 1993。我國學者的相關研究請參考顧忠華、鄭文輝, 1993；朱元鴻, 1995。

馬克思學派及其衍生的後工業主義、或後現代主義（Beck 1993a:70）。它們所關心的舊有的階級社會形式已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高度現代性意義的風險社會形式；在社會演化的角度上，當代已從階級社會發展為風險社會，在舊有的階級社會觀下，原先人們所關照的財富分配邏輯之不平等已無法圓滿解釋新的社會樣態；相反的，當代人類首先面對的衝擊，是風險社會分配邏輯下的危機及不平等問題³（Beck 1986; 1993a）。同時，相對於工業（主義）所預設安全體系的工業（階級）社會，貝克認為風險社會這個概念，應界定為現代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在此階段中期經由新的發展動能所引起的社會、政治、生態及個人的危機，已日漸遠離了工業社會控制與安全的制度化（Beck 1986:35）。因此，風險社會的產生便是起於傳統工業社會安全規範系統的崩潰。人們首要對此安全系統的質疑，便是決策程序的正當性問題與科技官僚理性的問題。從科技、風險、決策及制度化的討論，貝克嘗試以「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作為其思考社會理論的核心，我們可以從他所提出的關聯點，衍生出對現代性思考的另一番詮釋⁴。

³ 請參考顧忠華（1993）所作詳細的理論介紹及討論。

⁴ 「風險社會」作為 Beck 所指稱對當代社會的一個新的認識觀，其核心問題在於現代工業社會所支柱的安全與控制體系已喪失了解決由其所衍生之社會、政治、生態與個人等危機的效力。同時，激進的解決和發展這些問題的實踐推力就藉由「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觀點展開。對此術語的翻譯筆者採開放態度，期待仍有更為傳神的表達，但為更確定和釐清其意義，則以底下若干文脈來掌握其詮釋：

- (1) 首先扣緊於「風險社會」v. s. 「剩餘風險社會（Restrisikogesellschaft）」（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在線性理性邏輯下以知識增長和科學來主宰和支配現代社會的發展；因此，它認為所有危險仍然是可控制性、可計算性。也就是工業社會發展為其對現代化不斷的反思（Reflexion）和修正之「簡單的現代化」過程。
- (2) 一旦工業社會所造致的危險逼迫它承認其不可控制性、不可計算性，則工業社會將批判自身，並進入到風險社會的認識（Beck 1993:35）。因此，「風險社會是一個自身批判的社會（eine selbstkritische Gesellschaft）」

紀登思在其對現代性的討論中，也提出風險為其核心概念，同時亦主張「反身性的現代性」(Reflexiv Modernity)觀察。他從專家在當代所統治的社會秩序出發，聲言在今日社會多元分化的時代，專家所扮演如前現代教士作為文化守衛者的角色，已逐漸喪失了其主宰與詮釋「社會意義」的功能。在前現代，教士提供了在宗教、社會及精神層面疑問的解說與慰藉，在社會功能上，他們賦予了權威中心式的秩序安定意義，並掌握文化捍衛的職能，適時的提供「社會本體論上安全」的意義。相反於此中心式的、權威及不可挑戰性的地位，由於當代社會體系複雜分化，在各個領域有其亟需專業上解決的問題，每個專家只能提供特定領域部份的專業知識意見。同時，由於專業知識的本質是可爭論性的，並非普遍、統一的或不可打破的神話。因此，可爭論性的專業和專家知識，在現代已無法提供本體論上安全的意義，而使得人所面臨的是一個風險的抉擇(Giddens 1990; 1994)。現代人類已失去了其精神安全的避

(1993:50)。為何呢？

- (3)也就是，「在風險社會階段中，由工業-科技發展所引起危險的不可計算性之承認迫使整個社會的基礎進行自身的反省(Selbstreflexion)與重新檢證理性基礎。明顯的，在風險社會的理解上(嚴格的說)社會成為反身的(reflexiv)-也就是社會自身成為論題和問題。」(1993:47)。
- (4)反身性現代化「並非現代化的反思(Reflexion)、現代的自我關聯性或指涉性」(1993:31)，相反的，它是「區別和相對於反思性(Reflexion)，由工業社會的反思過渡到風險社會的反身性(Refleivität)，也就是說，反身性現代化意謂：自身面對(Selbstkonfrontation)於工業社會體系和其制度化規模所無能處理的風險社會結果」(1993:37)。簡單的說，反身性現代化為在(工業)現代化的基礎上社會自身(反身的)直接面對未意圖的、未預見的現代化後果。因此，現代社會自囿其發展的惡果；它反身的、自身面對現代化所產生種種未預期的、不可控制性和不可計算性的破壞。對於這樣的現象，現代社會自身也成為自我批判、自我改變的對象。
- (5)它們涉及了三個相關領域：一，工業社會與自然生態的關係；二，現代化所產生的危險性踰越社會安全標準，並動搖了現代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基礎；三，現代化導致個人主義化的危機(1993:36)。

風港，而處在專家多元爭論（如韋伯意義下的諸神戰鬥）、不知所措的處境。這樣的風險在目前最明顯的，莫過聳人的英國狂牛症問題。在病因懸疑、專家意見紛爭的情況下，英國政府仍堅持牛肉出口，市場分散原則，置全世界處於風險的情境之下（世界性或全球性的風險）⁵。這種全球性的風險正刺激了我們對現代性在風險意義下的思考。

從社會系統理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同意，現代社會系統因功能分化而日趨複雜化的現象，使得人們身現在現代的叢林之中。人類在當代存在的處境往往陷入一定的困境。如何剖解這多元體系、功能分化的社會機制，由其中抽絲剝繭的提出現代性的意義，便是當代社會科學家的任務。其中，風險社會議題的提出便是一個科學的進路。魯曼所切入風險社會議題的門徑，是將科學（Wissen）與社會系統分化關聯起來。當科學愈進步，社會系統的功能分化也隨之複雜起來。社會形態的變動，也就隨著與科學的互動而日益發展。其中也就夾雜風險的存在。因為，當社會系統自我分化的複雜性，如脫疆野馬般的不斷發展，不但使得人們無法透視社會的整體，掌握社會秩序的意義；更往往超出人類的負荷，而形成社會演化的危機（Halfmann 1996）。當代人類生存首要面對的是隨複雜社會分化所形成的「風險意識」：「當人們知道更多，人們也就更清楚，什麼是人們所不知道的，且就更加的形成風險意識」（Luhmann 1995:33）。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而言，風險意識等同於人類對現存社會秩序安定的不安與懷疑，它往往逼迫人們必須再去思考另一套

⁵ 專家們對 BSE 病因是否會傳染到人體身上爭論不休。同時英國政府頻頻對歐體市場施壓，相當引起民眾的反感與抗議。而部份問題牛肉是否被偷渡進口到檢驗制度較不完整的亞、非國家，也引人擔憂。

“應變”風險的秩序模式，來確定人類在當代高速變動的社會安身立命的原則。

風險議題作為二十世紀末社會科學的建構，正符合了人們對現代性意義的重新檢討。現代科學與科技催化了社會變動的可能性。除了令人思考，他們如何改變社會分化及社會行動的條件外，並模塑了新的社會秩序外，我們也值得反向思考，在什麼社會條件和社會目的下，人類催化了科學和科技的發展（Rammert 1989）。同時，其又帶來了什麼樣的副作用及和人類的關係。風險議題的產生，正是從這雙軌辯證的質問過程中，成為一個社會自我反省、建構的理論。社會科學界從七〇年代的科技官僚論戰，也因此當代「典範轉移」為風險社會理論的建構。

三、現代性與社會秩序的反思

風險社會議題對現代性的檢討，主要的出發點集中在理性、制度化、科學與科技政策等的正當性問題，最後則檢討社會認同的危機。在本節，我們將分別討論作為社會發展之理性化論題，及制度化危機對社會秩序帶來的衝擊。

（一）工業社會的理性邏輯與風險社會的「反身性」邏輯

自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的理性之光即支配著整個現代化運動的腳步，其中人類所服膺的，特別是因為自然科學機械觀的確立與工業革命的推波助瀾，即是以精確計算、目標導向的「目的理性」為準繩⁶。因此，整個工業社會文明化的的基，即牢牢的拴在這個單線

⁶ 新時代（啟蒙運動）確立了以人類理性為基礎的機械宇宙觀，逐漸脫離神性的宇宙觀。同時，根據人類理性主體，啟蒙運動強調進步的精神，科學或科技不再是神的創造物，而是自然機械法則的運用。自然的法則，即是機械式的秩序

式的、目的理性式的理性牢籠之中。貝克稱這種以單線、目的理性為基礎的現代化過程，即是他批判意義下「簡單的現代化」。在這個脈絡下意謂著，工業社會中政治、經濟及技術的行動價值－計算性、安全性、效率性等科學萬能信仰價值，便與科技官僚、全能國家之制度化連結起來，簡化為「科學理性」。在「目的理性」及狹隘的「科學理性」交織下，人類單純盲目的描述進步的圖像（進步主義者），或悲觀的拒絕科學文明的進展（悲觀主義者，如十九世紀浪漫主義學派），並無法深切掌握到工業社會真正問題的根本所在。人們將工業社會所產生的危機，祇視為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副作用或「剩餘式的風險」（Restrisiko）。因此，所有制度的設計與制度理念的詮釋，尤其是面對重大風險的挑戰，如生態破壞、基因科技對人類倫理的挑戰，皆在這個邏輯下自我正當化。

事實上，工業社會自我正當化的論述已出現重重危機。現代性的工程在社會科學家的眼光中不是漏洞百出，就是一個「未完成的計畫」（Habermas 1991）⁷。拉圖（Latour 1983）甚至從現代「理性二元分裂」的觀點（人與自然、理性與自然），激烈的批判「現代」根本仍未存在⁸。而除哈伯馬斯提出「溝通理性」、「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見解對目的理性進行系統性的批判外，貝克也嘗試從「反身性現代化」角度，重新整視工業社會的正當性基礎。簡單而言，貝克試圖以「反身性」（Reflexivität）的辯證思維，來取代單線式

法則。因此，自然法則便是一套目的式的、規範式的與機械條理式的秩序狀態（理性法），成為人類遵循的對象。

⁷ Habermas 批判這種以「目的理性」為基礎的現代化計畫之不足，人為現代社會應回到以「溝通理性」為基礎的發展機制。可參見 Habermas, 1991。

⁸ Latour 認為根據這種現代理性所形成的社會型態，尤其是以科學理性獨大的社會進步形式，往往造成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理性與自然的分裂關係。他這個觀點正與早期 Hegel 對現代公民社會的批判觀點不謀而合。後者請參見周桂田，1994。

的目的理性思維（Baumann 1991）。他指出，這個對現代化批判的主體，便是工業社會本身。工業社會自我詮釋及解決風險的系統，已隨其自我再生產的複雜性（資本主義擴張型的科技、社會組織的發展）而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因而風湧雲起的社會抗議運動、大量的社會失業、社會認同的危機及社會不平等的興起，構成了工業社會的主要基調。現代社會必須從這種自我難題的吊詭性，找尋新的發展出路。它必須重新自我檢證，揚棄原來「目的理性」規範系統下的社會制度基礎，如科學萬能專家統治與全能國家等，重新構造社會展的動能基礎。這個過程可稱之「風險的文明化」（Risikozivilisation, Beck 1993a:83）。人們遵循的不再是目的理性式的樂觀思考模式，而是全盤的反省到人類社會的未來與走向，以避免朝向一個自我毀滅的路徑。

在上述的脈絡中我們理解到，從工業社會過渡到風險社會，除了發揮反身的、自我批判的能力之外，也同時是一項具有自我建構、反省的社會建構過程。在此過程中，人類與社會共同承擔、面對與學習問題的根本解決。舉例而言，當整個社會面臨巨大的災難時，社會上的風險意識將更加濃厚，促使人們自我去學習、裁量風險解決與避開的可能性，如國際性的裁廢核武及生態運動下發展出的國際環保公約。從反身性的現代化理論角度而言，這種自律性的、反身性的自我批判邏輯，即是風險社會的發展（文明化）邏輯。

（二）制度化的危機與社會秩序

工業（風險）社會本身進一步要檢證的，便是其制度化下的生活形式及共識基礎。這可以分為鉅觀及微觀層面，就鉅觀層面便是制度化下社會秩序穩定性的問題。人們要問，在何種社會機制下產生秩序穩定性？就微觀層面，人們則問工業化制度快速變遷的過

程，如何帶來人類心理的不安定性⁹（Gehlen 1992）這兩個問題皆牽涉了當代工業社會制度化的形式。在當代既存舊有的三個社會運作型態為「工業社會」、「資產階級社會」及「全能國家」¹⁰（Beck 1993b）。這三者關聯為一，其共識的基礎即為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的擴張。而其信仰的邏輯即是前述安全的、計算的與控制的等目的理性之邏輯，將災難祇視為工業的副產品。

當代社會之所以稱為風險社會，其在於工業社會事實本身。人們必須承認在工業技術發展中災變的不可控制性和不可計算性（Beck 1993:32），如斐洛所指稱之「常態之意外」。在打破傳統對於安全體系的信仰，我們更清楚了生態環境的破壞之遠因。其不僅僅是單一的生態問題，而必須總體的歸結在整體的社會制度化問題，尤其是社會歷史條件所形成的科技條件與發展方向（Halfmann 1996; Rammert 1993）。科技的形成必須與其發展、建構之社會條件連結在一起。亦即，科技的行動來自社會的行動領域。整個社會制度化充分體現社會行動領域的內涵，這包含了「制度的信念」（如計算理性式的思惟）與「制度的結構」（風險、災難的解決機制），特別是政治決策問題。在目前代議政治體系下，往往強調國家政治主權原則，科技政策的操作，往往是科技官僚的禁嚮，一般人民則「必須」接受、相信其專業的統治。事實上，科技官僚的無能與欺蒙，陸陸續續反應在八〇年代以來重大的科技災變上。其以使得人逐漸對社會安全體系的信念產生重大的質疑。科技專家已無法對這種重大災害的不可預測性提出回答，並提供人們「本體論上的安全感」，反而是其科技詮釋的不可靠性、爭議性在穩定的社會秩序

⁹ 在這裏筆者試圖結合 Gehlen 對科技人類學的探討，分析科技進步對社會的衝擊與對人類心理微觀面的影響。

¹⁰ 指與科技官僚結合的國家機器，其以專家統治的形態出現。

中，激起了相當大不安的漣漪。人們的風險意識因而陡增，產生了魯曼所說的「風險的恐懼」（Luhmann 1995）。

同時，從科技與一般日常生活的關係而言，科學往往被理解為日常生活的型式之一。人們將科技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¹¹（Winner 1986），在生活中大量的與科技進行互動，如藥品、電腦或交通工具等，而不覺有何相異於其它生活對象。這個「理所當然」的意義與習慣在當代之風險社會已被打破，人們面臨的經常是無法判斷的風險。

從個體層面而言，如蓋倫所指出，人類對社會環境穩定性的需求滿足，往往提供了人內心安全的功能（Gehlen 1992）。蓋倫已意識到在工業化進程中，大量制度、社會形態及價值觀改變，已撞擊到人類心理系統的穩定性，進而對制度的變遷產生不安，而這種情形在當代風險社會尤甚。當代社會系統功能複雜分化，科學進步導致社會專業更趨分工，制度的變動亦更為劇烈。因此，人們就更無法掌握社會變動的態勢。相對的，科技社會的進展又往往超出人類所能承受的能力¹²。所以，在風險社會生存下的當代人類心理，更存有不安定的叢結。從現代性的角度而言，上述鉅觀與微觀的分析，分別代表社會共識基礎的喪失與個體普遍不安的現象，這隱喻著社會既存機制的不穩定性和危機性。人們不禁要問，當代（風險）社會秩序如何可能？如果我們從積極面向接受人類與科技的關係為一個社會學習與適應的過程，那麼，我們就必須將此觀點與前述貝

¹¹ 這個可以理解為像 Geertz 對日常生活的詮釋。Geertz, C., 1973。

¹² 目前工業社會的發展邏輯是以「單線理性」、「計理性」為主導，因此在這個脈絡意義下經常是以「經濟理性」支配為主，科技理性為副的發展樣態，進行繼續工業化的過程，而往往忽略了「社會理性」的機制。同時，並不考慮到社會無論在制度、價值或物理層面的承受能力，如人們每日生活對基因食品的健康疑慮，或者每天不知不覺的承受過度的輻射線而造成的不知名傷害。

克「反身性」見解連接起來。在風險社會中，人類面對的是要求自我批判、自我成長及自我改變工業社會的基本邏輯與型態。而其重要的方式，即是積極的參與並建構反省討論的社會。

四、現代性與風險結構

(一) 風險結構與社會分化

如果我們大膽的從理論連貫性和當代性意義的角度來說，我們必須強調，社會結構分化的論題一開始即是現代性的論題，也是風險社會問題的起源。從社會分化理論的始祖涂爾幹所提出的分工論、馬克思眼中的勞動分工異化、派深思的AGIL 模組，到當代魯曼的系統理論及哈伯瑪斯關於生活世界受系統的殖民化觀點，皆可斧鑿斑斑的看到這些理論家致力於現代性結構的思考，為社會分化的現代性風險下個註腳。同時，社會結構分化除了具有鉅觀層次的意涵，也關涉到微觀面向之社會認同與社會意識發展的問題。如王得落（Van der Loo 1992）所指出現代社會化的弔詭性。一方面現代社會分化的結構規模逐漸增加，日益有全球性的趨勢（鉅觀）；而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分化的主體規模亦逐漸縮小，甚至已微細到個體的層次¹³。後者我們將從涂爾幹提出集體意識弱化的問題、齊美爾對個人主義趨勢的討論，到貝克指涉風險社會個人主義化的危機，來掌握風險結構的微觀面向問題。

現代是處於一個全球化的風險社會，各個社會內部系統自我複雜分化，並共時性的發生於全世界各個角落。無論是西方或東方社

¹³ 從這兩方面，代表著現代性的風險結構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全球性的結構分化；其次是個體與社會分化發展的緊張性關係。

會，皆離不開這種世界性社會分化規模的擴張結構（如資本主義深化、全球戰略體系與跨國性的組織）。同時，這分化過程往往夾雜有同質化的發展，如美國化或麥當勞式文化。而在這種全球共時性的社會系統分化之中，佔最重要角色的莫如魯曼所指出政治、經濟和科學三個社會次系統（Luhmann 1995）。這三個次系統主宰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我們在之前曾提及，科學的進步導致社會系統分化複雜性的增加與風險社會的形成。但科學的行動決定，先前必定要有社會的條件成因，才能影響科學的發展方向。哈夫曼（Halfmann 1996）甚至指出，科學（技）本身並非社會演化的主體，它並不能如其他社會次體系般的自我再生產、自我分化。相反的，科學（技）的演化必須依賴於社會的脈絡。社會系統首先自行生產「變數」（Variation），並進行「選擇」（Selektion），再由社會系統不斷的嘗試、學習的過程完成「穩定化」（Stabilisierung）。例如，科技政策往往在一定社會意識形態的選擇下（工業理性、經濟理性或社會理性）而決定。因此，科技演化是一個社會系統自我生產的結果。人們進一步可追問的是，在當代是什麼樣的社會機制產生變數、選擇與穩定的模塑現代社會的危機。

從上述指出的政治、經濟與科學三個主導次系統，我們可以相當清楚的掌握，對當代科學（技）權力的佔有與對其工具性支配的政治、經濟系統是構成現代風險社會的主要關鍵。科技的發展，在當代充分的失去其自主性，它隸屬為政治、經濟的產品，在一切「進步、發展」的目的理性意識型態下，它失去了自我發展的自主性動能。因此，貝克大聲疾呼「讓科技解放！讓科技多元自主發展！」（Beck 1986）。也就是說，當代社會在自我結構化的過程中，陷入了「目的理性」的發展邏輯，而忽略了其他意義的可能性。在這種

過程中，社會雖不斷的自我再生產與再結構，卻也不斷將社會帶向一個危險的情境，或導致一個扭曲的現代性¹⁴。

進一步而言，現代社會的風險結構建立在以政治經濟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科技官僚機制上。根據這個機制，現代國家進行其全能的統治。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許多研究均指出此種科學代議統治所造成現代性結構的扭曲（Latour 1995; Beck 1993a），特別是代議政治剝除公民參與和建構社會認同的權力。而參與、實踐正是人們學習、建構對現代認同之開端，由此人類重新凝聚社群意識（Barber 1995; Taylor 1994）。因此，我們要追問的是，在微觀面上最基礎的社會認同與集體意識在當代風險結構的樣態為何？由此，進一步探問它們所關涉人類行動的自由意義在風險社會的發展。

因此，以此風險結構的新衝擊，我們不禁要回到古典的社會連帶問題：社會集體意識真的消失了嗎？社會認同如何可能？涂爾幹意義下的集體意識，意謂著個人接受並分享超於個人之團體價值和規範。在現代化的社會分化（分工）進程中，「社會連帶」從「有機連帶」到「機械連帶」逐漸鬆動，社會集體意識面臨新的問題，個人的社會認同也同樣受到挑戰。於我們的觀察中，前現代的社會集體意識凝聚力強，人們對社會的認同相當一致，其意涵社會控制形式中心化和權威化。相反的，在現代高度複雜分化的社會，人們集體意識與社會認同隨社會各領域的分化，出現多元而緊張的關

¹⁴ 魯曼指出，社會演化的邏輯並非完全樂觀的朝向良性的「進步」發展，相反的，它亦可能朝向自我毀滅的方向不斷再生產，如生態危機即是一例。可參見 Luhmann, 1986。事實上，各國窮兵黷武的核武競賽，已成為人類文明演化的最大危機。如果我們從批判性的角度出發，值得發問的是，為何社會演化竟然朝向自我異化、自我毀滅的發展，其造致的歷史社會條件如何，並應如何避免。筆者相當同意 Wehling 的批評，他認為 Luhmann 在這個論點上局限於規範性的論述，僅僅陳述了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實，並沒有切確的提出社會演化邏輯背後的條件及其發展方向的成因。請參見 Wehling, 1992。

係。尤其在風險社會結構的發展中集體意識並未消失，而僅是被各分化的系統重新取代、操弄，亦即被「專家（或科技官僚）」所操弄的詮釋和論述而取代。我們在現代的生活到處充滿專家，專家們充斥了消費、政治、社會、科技、藝術，甚至宗教與哲學等不同領域。這些專家主導論述的霸權，也支配性的生產其「專業」的知識產品，甚至設計、規劃人類的生命權力。因此，社會舊有權威形式的中心，頓時被各個領域的專業代言人所取代。而由於專家知識經常是可爭議、可取代的，但又相當具有部份權威，故其呈顯為多元權威的態勢。在這個結構上，集體意識並未真正消失，其僅是隱匿於多元權威的背後。

我們當下關心的在於，集體意識與社會認同在現代被專家的多元權威取代與操弄，人們反而落入了選擇的困惑與緊張之中。由於專家知識是可爭議的，因此，在社會系統分化的配置上，專家只能侷限於對複雜現象的某一部份提供詮釋和假說，頓時使得現代生活充斥許多可能、論爭與不明確性，人們經常不知在這麼多的專家爭議中何去何從，並且在不明確的複雜現象上感到恐慌，更難於找出一致的觀念符合大家所期待的社會認同。根本上，人們失去了「本體論上安全」的憑藉，失去了對原先社會秩序的「信任」¹⁵（Giddens 1990）。最後，人們被迫面對渺小的自我決定。

這種自我決定使得在表面上人們選擇性增加，但事實上卻使人們立即而明顯的陷入無助的風險的情境。風險意識即隨著社會日趨分化而陡增。韋伯主張人在諸神鬥爭的現代性困境下，必須勇敢的回到自律式的「責任倫理」上；但從風險社會的眼光，其卻有實踐上弔詭的困境。在當代風險社會中，個人面對的往往是龐大的社會

¹⁵ 從「信任」的觀點，Giddens 一針見血的切中了人與當代社會的緊張關係。

機制叢結，以單人之力搏鬥一個巨大怪獸，實是力有未逮¹⁶。同時，人們在對抗某一領域的專家論述時，卻經常又必須借用專家的意見，這樣弔詭的過程往往又是「風險的循環」（Beck 1993a）。現代性因此是一個風險的選擇，人們憑藉著有限的知識、資訊和判斷，來抉擇自己不確定的未來（例如，到底我們要不要購買基因科機商品。）。

（二）風險社會與自然

討論現代性與風險社會結構的另一個重要命題即「自然」與「社會」的關係。這個命題實質上有二個切入點：一，自然在現代社會的發展定位；二，自然生態破壞之危機對現代社會的意義。一般而言，就分析自然與社會的關係，集中在兩個相對的路徑，它們分別為自然主義（Naturalismus）與社會中心主義（Soziozentrismus）（Scharping & Görg 1994）。

自然主義者認為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份。並且，人類本身作為「自然」，有其社會發展的意義。人類自一開始透過反覆熟悉的練習，學得掌握自己的軀體自然與一些簡單的工具，同時逐漸學會一定的技藝¹⁷。無論透過對自己軀體或對簡單工具的操作，人類逐漸獲得一些技巧，這就是技術（科技）的開始。技術（科技），

¹⁶ 現代人類的困境不再只是去面對政治上的「利維坦」（Levithan），而必去面對日益複雜與龐大的「社會利維坦」。以西方式的回到自律的「責任倫理」思考或「實踐理性」的傳統，無論理論或實踐精神上皆趨於枯竭，而以社群關係為主文化邏輯的台灣社會，似乎也無法提供一個安身立命的場址，調和人在現代的危機。

¹⁷ 這種過程在 Hegel 而言，即是自我教養的實現。人透過反覆學習逐漸把握自然（包括軀體自然），並發展自己的理性面向。而這種從自然到理性的發展關係是和諧的與連貫的，理性（技術）不壓制、異化自然；相同的，自然不踰越理性。

在柏拉圖的意義下，為人類運用智性（認識）對自然的模仿（Halfmann 1996）。或者，如蓋倫所主張的，人類本身的自然就是一個「缺陷體」（Mangelwesen），需要科技的輔助（Gehlen 1990）¹⁸。在這個意義之下，技術（科技）本就屬於人類自然的一部份。因此，人類、科技和自然的關係本身就是和諧的，而非對立的。上述自然主義者的化約觀點首先會面臨二個難題，即它必須去處理經由人類社會所行動、認知或（自然）科學化發展的自然關係，以及在社會文明發展程序中自然或生態意義的演變（Scharping & Görg 1994）。也就是說，自然主義者企圖在認識論上去定位純粹自然的整體觀（自然先存論）有其困難性。

社會中心論者則認為，自然觀念僅是特定文化觀念下的產物，並且，它因此在社會（客體）的象徵化過程中扮演了物質－材料面向（Stofflich-materielle Aspekte）的意義（Scharping & Görg 1994）。所謂社會的象徵化過程意謂著人類社會行動的象徵性面向，具體而言，它指涉社會中的文化符碼、或制度性機制的形成、演變與發展。在這個程序中，它主宰與詮釋自然生態環境在當代的意義。根據這個進路，在當代社會，「自然」已徹底的「人類中心主義化」，自然在人的思維上變成了「生態」或「環境」，而對生態問題的解決卻成為人類道德思考與學習的一部份；或者，自然成了工業主義下的「物質材料」、工業加工的「對象」，並被生產為「商品」。相對的，在前現代，人類僅是透過科技維持對自然災害的控制，人和自然仍是處於動態的平衡。而這個平衡，在工業革命以來已快速被打破。工業社會的發展，產生社會系統日漸複雜性的分化，政治、經濟的次系統在目的理性的思維模式下，迅速支配各個社會相關的

¹⁸ Moscovici 也同意技術不但作為人類的工具，同時亦屬於人類自身的一部份。可參見 Moscovici, S., 1990。

次體系。尤其是二十世紀末期，專業知識分工、社會組織不斷擴張與日益氾濫的資訊，使得人類、自然世界成為整個工業社會大實驗室的試驗對象，人和自然的關係也因此不斷在轉變。人類本身甚至變為科技建構的客體。在「物理」上，人類可能經由醫藥及基因科技而被改變；在「社會」上，人類被迫屈服於資本、技術生產的邏輯；在「象徵」上，人類逐漸被視為機械來想像，並作為勞動商品出售（Schelsky 1965:449）。例如，當代資訊社會的興起已對人類帶來進一步的衝擊。人類在資訊工業的繼續演化下，逐漸被異化為資訊傳輸管上的「擬像」，造致人的社會認同產生危機。在這個風險結構的發展過程中，人類生存的社會條件、行動意義與生態關係正逐漸的改變。

對於此種惡質化現象－人文及環境生態的危機－貝克反過頭來就文化主義者的立場提出了「風險」觀點，也就是從現代工業主義文化、象徵中所擬定的自然生態與安全體系觀整個崩潰。同時，生態危機根本上是現代工業社會制度化的危機問題（Scharping & Görg 1994）。當代社會生態的危機逾越了人們在工業社會中所認識和憑藉的安全信仰和規範。總體來說，科學進步所導致社會功能分化與複雜性的昇高，造成了社會成為一個龐大、無法掌握的客體，並具有「無法透視」的性質¹⁹。人類處在其中，已把握不到理所當然的生存意義，因為人類已無法認清自己所處當代社會的複雜性。人們每天在生活領域所面對的，經常是感覺與經驗的模糊性與不安全性。面對每日與生活周遭環境的互動，如對基因食品、藥物的疑慮等，人們皆無法由自身的經驗與能力了解問題的原因和理由，反而

¹⁹ 請參考 Habermas 所提出的「無法透視性」觀點。Habermas, 1985. 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人們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即是這個不斷自我再生產、日益複雜分化的社會，已使得人們無法掌握。

必須藉由第二隻手－專家－來解釋。這種日常生活經驗中所意識與所感知（perception）的不確定性，經常使得人們陷入了風險的情境（Douglas 1982）。例如，人們常常覺察不出其生活周遭的危險性，如輻射。這種對生存環境的不可掌握性、不可透視性與不可察覺性，構成了對人類的強大威脅。

事實上，筆者認為，貝克於風險社會觀點下所指涉的自然觀，是相當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它甚至超越前述二者兩種定義式的自然主義和社會中心主義，而進一步指陳更澈底的（自然與社會關係）自我批判、自我演變的觀察－這就回到了最根本的風險社會「反身性」思考。

面對二十世紀末高度的自然生態破壞，貝克指出，所有過去對自然與社會二元對立關係的討論均被揚棄。「自然和社會對立的結束」（Beck 1986:107）意謂著，在當代嚴重的生態破壞下，人們理解中的自然已脫離不了（現代）社會，而社會也不再純粹是人類自我中心主導的局面，它必須關照自然－人們所生存的生態發展。也就是說，從「反身性」的角度來看，生態的危機逼使自然與社會的關係不僅更加緊密，更越過人類認識論上對此二者原本的界限，而直指「自然環境的問題根本上就是（經由）社會的問題」（Beck 1986:108）。高度生態毀滅的危機「建構」出超越自然與社會對立的認知－無論是純粹的自然先存觀，或社會主宰與形塑自然的看法－人類面對的是赤裸裸的自然和社會一起自我威脅、毀壞的風險。這種建構過程，事實上，也就是工業社會文明化的果實。工業社會文明化，也就是對自然的社會化過程，同時它也是「破壞、威脅自然的社會化」過程（Die Vergesellschaftung der Naturzerstörungen und -gefährdungen）。它建構出了一個威脅、危及自然的文明化社會，並在這個過程中，演變為威脅、危及到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

等系統的發展。因此，現代生態危機是全面的、總體的、無所不自我威脅、批判的風險社會。

（三）科學化的現代社會

1、科技權力的代議結構

科技在現代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科技影響人類社會行動的條件與方式。但反過頭來，社會的制度與行動的領域決定科技的發展。因此，這是二者交互辯證的過程。科學的理性雖然成了推動社會文明化的驅動器，但它更建立在「社會理性」的基礎之上，從「社會認知」的和「規範」的興趣出發（Gloede 1994）。簡單來說，科技的發展應符合社會分配的正義、政治決策的正當性和社會秩序的安定性要求。

在當代風險社會，「科學理性」經常壓制「社會理性」。「科學理性」的判斷往往成了整個社會判斷或政策決定最後的根據。專家的意見，通常依照一套「專業」的統計數據和說詞來証驗自己的正當性，其他的「門外漢」則無可有置喙的餘的。專家們決定了社會認知的空間，也規定了社會的分配，同時，又是社會秩序的生產者，他們「安排」、「推動」了社會秩序的變動。但是，隱藏在這套「專家認知」背後的社會機制是什麼呢？

拉圖指出，現代社會對科學的態度，依然依循著霍布斯式的「權力就是認識」的觀點（Latour 1995:30）。霍布斯所設想的權力分配邏輯，在政治上講求國家主權的必要性和代議制度的行使。根據社會契約的概念，政治上的公民必須服膺在這套代議體制下，以維持社會秩序不至於再陷入自然狀態的混亂。做為「利維坦」（Levithan），國家主權的絕對保障，才能確實的穩定整體的社會

秩序，消除「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事實上，這套假說作為自由主義代議政治思想的根源之一，在當代已受到強烈的挑戰。尤其是來自「社群主義」（Kommunitarismus）和「商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kratie）的批判。恰巧的，這套政治制度和其意識形態整個全盤的轉移到科學領域上。「科學的代議士」，所謂的「專家」，利用社會意識形態的優先性和先天既有的統治權力，去決定並正當化其知識的中心權威。同時，經由這個程序，更穩固其科學代議制度一元化的權力結構。因此，科技官僚和全能國家的統治自我正當化，往往是人類社會在面對科技文明系統快速發展，陷入風險情境的關鍵之一。因為，透過這個政治機制，阻礙了人類與科技共同反省、成長的機會。

2、「社會理性」與科技政策

要解決當代風險社會的困境，必須重新審議「社會理性」的意義，包括社會分配的正義性、政治決策的正當性和社會秩序的安定性等。更根本的，是對全盤政治體系（代議民主）的檢討。「科技民主」的概念很早就被提出（Mumford 1986; Sohn 1994; Winner 1992）。科技民主的理念試圖打破「專家一門外漢」的界限，將科技的決策帶入社會理性的決定之中。我們若進一步推演，也就是將「科學的理性」，擺於「社會理性」的一環共同考慮。「科學的理性」不再視為唯一的、目的式的準則。專家的專業意見只是提供為社會總體決策的參考而非先驗的定論。同時，「專家一門外漢」的界限被打破，因為人們已意識到，承擔整體社會風險責任的主體非僅是專家，而是全體的社會。「科技民主」的意義，也降低了科技

官僚統治的獨裁面向，一般的社會公民皆有參與科技政策決定的權力。

在「科技民主」的理念下，同時發展出「科技公民權」(Technological Citizenship)和「社會契約式的科技決策」(Sozialverträgliche Technikgestaltung)兩個觀點。「科技公民權」要求人民有權知道訊息、有權參與科技決策及有權形成決策的共識。它保障人們自由、自律與尊嚴等基本權力原則(Frankenfeld 1992)。就分析而言，「科技公民權」凸顯了人類在風險社會中另一個自然權利的發揮，隨著財產權、政治權及社會權之後，另一個與當代歷史社會變動鬥爭的主張²⁰。「社會契約式的科技決策」觀點，起源於科技所帶來的社會危機。科技的發展除了在經濟、生態與人類健康上產生重大的改變外，也造成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在當代，科技已非單純的僅以科學的眼光來看待，而必從一開始便顧慮到社會整體，尤其是接受者的特徵考量。例如整體社會倫理接受與調整的可能性、生態環境變化對人影響的可能性，或者地緣上社會歷史的維持性等。因此，科技的決策形成於具有「社會契約」意涵的公民參與過程，它同於「科技公民權」的主張，強調公民自主參與科技決策的辯論(Ehlert, W. 1992)。

事實上，若我們更清楚掌握拉圖對當代科學代議性的批判，對於「科技民主」、「科技公民權」與「社會契約的科技形塑」等觀點，就有理論上值得補充的的方。當代自由主義意義下的代議民主政治，在現實的實踐上屢遭批判。最明顯的莫過於它導致公民政治權力實質的喪失。公民在代議士對權力的把持與操弄下，日漸疏離

²⁰ 自然權利(Naturrecht)的演變，從最早洛克主張的「財產權」和「政治權」，發展為 Marschall 所強調的「社會權」。在當代則被進一步詮釋為「科技公民權」。

對政治的關心，人們亦因此喪失社群生活的意義，龐大的社會群體一個個疏離為孤單的原子，這形成當代民主的危機。對於「自由主義」批判的議題興起於八〇年代，主要的代表者「社群主義」和「商議民主」試圖在社會行動實踐上，修正代議體制的弊病（Barber 1995; Habermas 1992, 1995）。這些論題的主要貢獻，是重新讓人審視傳統代議民主體制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關係。如社群主義者強調社會共同體的重構與其要件；商議民主理念主張人民政治參與及理性溝通的必然性。從文化社會學的面向而言，這兩個學派洞見了代議民主機制的缺陷，並掌握了工業社會伴隨而來的社會抗議運動之能動意義，企圖將社會實踐和直接民主的內涵應用於當代社會民主體制之上。弗斯特（Forst 1994）就指出，當代「公民社會」的內涵不再局限於傳統資產階級社會的觀點——如黑格爾將公民社會僅視為資產階級的「需求體系」²¹。相反的，當代公民社會的意義根本上與「商議民主」的理念緊密結合再一起。公民社會本身就作為一個政治溝通、公共政策辯論的場域，它是一個政治的共同體，國家與整體社會公共事務，就在這場域內由人民的參與、溝通解決。因此，政治事務與政治決策的完成便在公民社會的領域中進行。這個新的公民社會觀即將現代社會導向一個「討論的社會」。而此見解正與貝克不謀而合。

貝克從「反身性現代化」觀點指出，當代政治上的資產階級在理念上應建立一個「由下往上的政治」（Subpolitik）的行動觀。它認為，面對晚期資本主義以經濟為支配社會主要邏輯，當代公民應結合起來，透過社團組織的力量，建構一個討論的社會，來對抗並

²¹ Hegel 將「公民社會」僅僅視為一個符合資產階級利益與滿足的場所，它無法提供正義及社會公平的功能。因此 Hegel 批判它為「否定的倫理」（Negative Ethik）。Marx 便是接續此脈絡發展其政治經濟學批判。請參見周桂田，1994。

消解其不正義和不正当性。在這個討論的社會中，生態道德、倫理及社會責任將不斷暴露在社會公眾面前，人們經由反省的、討論的溝通程序，一起對社會、經濟與科技的關係進行檢討，逐漸改變經濟/科技之行動邏輯，並逼迫工業本身或企業內部對社會責任正當性的思考。

進一步而言，要將社會理性的元素納入現代性危機的思考，就必須在總體戰略上建立社會理性的溝通機制。其意義有兩個，一是補充「科技公民權」的不足；二是解消「全能國家」、「科技官僚」與「經濟理性」的獨裁。「科技公民權」的觀點，並沒有全盤掌握社會溝通的機制，在理論上本來就有再陷入代議政治體系惡性循環的面向。因此，除了強調直接參與的原則之外，仍必須考慮到溝通的、商談的原則。在風險意義上，現代公民社會必然是一個「討論談判的系統」（Diskursives Verhandlungssystem），它是辯論的、對話的、溝通的與程序的，並且是一個競爭、規範的民主正當性模型。人們充分重視討論的理性與程序溝通的理性，並在這個機制下，透過反身性、學習性及參與性，去建構一個自我調整的社會。

五、風險的自由

當代社會由於科學高度的進步，科技、知識與資訊大量的生產及輸出，社會形態發展成高度的專業分工，社會系統也形成複雜分化的現象。這個過程，套用涂爾幹的術語，代表人類已進入另一個新的「機械連帶」階段。也就是說，人類社群的關係與集體意識的認同，受到整個社會多元分化的影響，產生了生態性（人類生態）的變化。人類的集體意識不再取向於中心與權威的形式，而是由不同領域的專家所取代。社會控制的形式也不再定位於一尊，而呈現鬆動的傾向。這些現象到底是否意謂人類從一元式的社會控制形式

完全得到解放，亦或僅是變種的社會控制形式，而繼續陷人類於被支配的情境中；或者，它是一個現代性的弔詭，人類從多元的選擇可能性中仍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當代社會發展為社會領域相互差異性、去中心化、分散性與多元性。個體在這個社會形式較能展現個別性與個人主體自由（Rehberg 1990），而不再拘束於一個集體的與單元同質的社會中。也就是，隨著社會連帶的鬆解，現代生活關係的多面向化、自我空間化、隱密化與多選擇化，人類生活的文化形式呈現分散的結構（Castoriadis 1990）。法國後現代理論家李歐塔（Lyotard 1985）同時注意到了知識和科技在現代社會的意義。他的出發點是，在新科學的影響之下，知識在當代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中處於怎樣情境，並扮演如何的角色？李歐塔樂觀的認為，在科學不斷進步下，當代知識所體現的是異質、多元，而非單元同一的。換句話說，人類的知識、思想形態不再如同過去，定位於一個以單一理性為基礎的、中心式的「大後設敘述」（Große Meta-erzählung），如正義、真理等原則，而是呈現分化的結構（Welsch 1990）。人類隨著這分化的結構在不同社會歷史的場域中，創造並發展多元的自主性。其中，科學的進步位居樞紐的位。這個觀點，凸顯了人類不再被「馴服」在一個社會的單一理性下，在積極面上，人類似乎多了許多選擇和自由。

上述的觀點打破了工業社會單一支配邏輯的思考，尤其是經濟支配的邏輯。社會理論因此架設在多元理性、多元主體的立場上，不再僅以馬克思的階級為實踐分析的主體，而是同時顧及各個社會領域作為實踐主體的意涵。在這個脈絡下，它是接近「反身性現代化」理論。但對於社會形式及知識、科學分化進步的掌握，以及在其機制下個人自由的發展與從社會「解放」的觀察，仍不能過度

的樂觀，並化約為現代個人理性自律的行動結果。王得落指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戲劇性的充滿四個不同的弔詭現象，其分別是「分化的弔詭」、「理性化的弔詭」、「個人主義化的弔詭」及「馴服的弔詭」（Van der Loo 1992）。當代社會分化經常具有全球性的同質化現象，其反映在理性化的弔詭上。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理性化一方面不僅朝向多元化發展，如重視多元理性、多元（的域）文化；一方面又集中向普遍化的形態，較明顯的，及是以歐美文化為模仿的美國化或歐洲化，如麥當勞速食文化、好萊塢化。同樣的，在當代個人意識抬頭，人們強調隱私與行動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相當依賴於社會機制和照護的系統。如大眾消費機制與國家的福利給付。在社會馴服的解放上，人們一方面擺脫了單元理性的控制系統，但另一方面卻更依賴於科技的多元系統——這也就是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集體意識在現代社會並未消失，而是由專家系統所取代。因此，社會控制形式雖然去權威化、去中心化，卻由多元的專家理性所重新支配，成為新的控制形式。雖然人們在表面上有選擇的自由，事實上是陷入了不知所措的風險情境。同時，人們必須檢証的是，是否我們真的從單元的、獨佔的理性控制系統解放了。事實上，在當代風險社會中，人們依賴於專家代表的多元系統，一方面確實是具有多元選擇風險的意義；但另一方面，在專家系統背後所支配的仍是獨大的政治、經濟理性與被此二者支配的科技理性在作祟。因此，選擇的自由是有限的²²。

²² 如前述美國基因豆芽即將輸入歐體市場，人們必須注意到其背後資本案強力遊說、運作政治的過程。可見的未來，在人們對基因豆芽的疑慮未消失之前，世界各角落的貨物架上早擺滿了唯一低成本的、物美價廉的基因豆芽，強迫消費者「自由的」選擇購買。另一例是，根據報導未來十年內，這些正急速經濟成長的亞洲國家，包括台灣、南韓、泰國、中國、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正是西方資本國輸入核能電廠的最大市場。在資本與政治機制的操弄下，未來這個區域最多的核能安全專家即是資本案、官僚及為其背書的法制設計者。關於未來

同樣的，從個人主義化的觀點，貝克也指出當代人類所享有的僅是一種「風險的自由」(Riskante Freiheit)。一方面，結合科技進步和社會制度分化的角度，貝克看到的是人類社會整合的危機。科技的進步使得社會的制度逐漸分化，特別是工作場域的改變(工作的點的去中心化)、工作時間的調整等。這種當代工作制度形態的改變，輕易的導致了人類在工作領域的危機。人們喪失了他在工作場域中與他人互動、學習，並增加肯認和相互認同的機會，進而失去了與社會連結的網絡，同時削弱了人的溝通能力，這使得人類陷入了自我中心的泥沼之中。另一方面，科技的進步也發展出了大眾消費市場及大眾媒體的擴張，這個趨勢更造致了個人在消費和行動模型式上追隨大眾市場的「標準化」(Standardisierung)，如流行、生活美學文化。這種機制表面上鼓勵每個人自我成為行動的中心，建立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圖像，隱匿在消費社會中享受自己所喜好、選擇的商品，但事實上所有人皆遵循同樣的商品邏輯，這個商品邏輯卻是一個刻意被設計的、多元的選擇，因此個人主義化只是一個在標準化、水平式的(所有人等同式的)多元化假象或弔詭。貝克認為，在這種社會機制下往往鼓勵「個人主義化」的發展。這些現象，事實上並沒有增加個人的自由，反而使每個個體陷入自由選擇的困境，因為每個個體被迫在這個機制中面對自我決定，人們失去了社會連繫的參考依據，而必須在高度複雜而變動的社會中進行無所憑藉的選擇。也就是說，現代性社會所提供給個人的，是一個失去依靠的、不安穩的選擇機會。因此，人們為了逃避這樣的風險性，最方便的門徑，便是一味的追隨標準的、大眾的、流行的社會模式，如休閒的型態、消費的模式，甚至政治的觀點、專家的見解。這種追隨大眾標準化的方式，一方面保有多元化

(在標準化意義下)的選擇，另一方面又能保持以自我為中心的情境。而事實上這種風險的選擇，正體現了當代社會新的控制形式，也正指涉風險自由的弔詭面向。

六、結論

從本文的分析脈絡中，我們可以輪廓的掌握現代社會作為風險社會的理論意涵。自「典範轉移」的角度，我們理解到傳統社會理論分析空間及分析能量的不足。它們侷限於對工業社會興起、發展與組織現象的詮釋和批判，並無法掌握近二百年來，特別是二十世紀末工業社會演變的形態以及其所產生不同面向的危機。因此，風險社會理論的建構，我們毋寧視之為一個社會自我再反省、再建構的實踐性理論。

觀察現代社會秩序和現代性意義，總體來說，可以從價值面向、系統面向、制度面向及日常生活面向來做分析。從價值面出發，貝克所提出的「反身性現代化」理論適足說明了當代社會的根本危機。當代工業社會的發展相當貧乏的、片面的繼承了自啟蒙運動的進步意識形態，因此，以單線發展的、進步的價值前提下，形成了「經濟理性」獨大、「科學理性」為輔的社會生產形態，而完全忽略了符合社會分配正義、社會發展平衡正當性等「社會理性」意涵。因此，今日我們到處所看到的危機，即是現代社會發展已逾越了人類所能承受的能力。

魯曼所提供的社會系統觀點雖缺乏批判面向，但也清楚的指出了社會系統日趨複雜分化的意義。在文中我們也由此比較以政治系統及經濟系統為主導的社會自我再生產方式（社會演化），並論析科技系統如何臣服於其下成為一個非自主的發展體系。從這個不平

衡的社會系統發展關係上，我們看到現代社會如何形成風險社會的根本脈絡。

與上述價值與系統面向相扣連，並值得注意的是制度面向意義下的科技官僚政治。當代科技官僚政治充分體現「全能國家」與「科技代議士」的精神。科技專家與官僚形塑並決定科技政策，同時主導科技與社會關係的霸權。但由於二十世紀末重大災變不斷，他們無法提出確切的解決，科技代議制度因此受到強烈的挑戰。文中筆者也結合了「社群主義」與「商議民主」的理論內涵，重構當代公民社會觀點，以補足「科技民主」與「科技公民權」兩個重要理念。我們視當代公民社會為一個政治公共事務討論的、溝通的場址，政治公民在這個政治共同體中，有權利積極的參與科技政策的決定與訊息的交換，並且是在一個具社會反省的、討論的及相互容忍的程序下進行。

再回到文化詮釋的角度，科技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人與科技的互動變為每日規律的、必要的過程。因此，科技生活就成為人類現代思維中理所當然的一部份。但從批判面而言，由於當代科技伴隨社會的發展過速，往往逾越人類的承載能力，人類因此失去了對社會的安全感與信賴感。科技與日常生活的關係，也就產生了一種日常風險的意義。

上述這個問題意識，促使我們在風險社會的人類學觀察中做了進一步的闡析。當代社會科技系統不但異化了人與科技在日常生活上的關係，也異化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無論在物理上、在社會上或在象徵上，人類（自然）逐漸成為科技的客體，成為生產的對象與操弄的工具。人類在當代生存的處境認同與意義已徹底的被改變。人的人類學在這個脈絡下成為「被客體化」、「被異化」的人類學。而反過頭來說，人類作為主體，也並不能把握這個日益複雜的社會

客體。科技愈單線式的發展，人類就顯得更迷失，因為他無法去掌握和詮釋這個不可透析的、同時逾越社會理性的發展機制。面對這個「社會的利維坦」，人的人類學意識也就成為風險意識。

在最後一節有關風險自由的討論，我們指出了人類在當代社會中自由的弔詭性。我們運用了王得落《現代化的弔詭》一書的觀點，提出現代社會分化與社會認同的緊張性看法。現代社會分化的發展機制，如工作時間、地點或大眾消費、大眾媒體等，一方面激化了「個人主義化」的發展與危機，一方面又形成全球水平式的、標準式的發展模式。因此，就表面上而言，人們脫離了舊社會形態單一理性的社會控制，達到了自主的、多元的、異質的甚至分散的解放發展；但就深層而言，這種自主解放又被擺佈於全球同步、標準的分化模式中。在科技上就體現於專家多元理性之中，社會集體意識被專家多元理性、多元權威所瓜分；在消費上就體現於全球流行的大眾市場上，如麥當勞或麥克傑克森的搖滾音樂；在媒體上就體現於不斷複製的大眾媒體市場上，如好萊塢電影。事實上，人類處在這樣到處充滿刻意操作、滲透的社會及文化結構之中，這個「文化的工具箱」雖以多元繁複的形式出現，有如萬花筒般，但適足以使人類迷失其中。因為人們不知哪一種風險的選擇對自己最有利，因此跟隨與服從大眾多數多元的選擇是「最安全」的「自由」。因此，「自由」在當代社會也是一種現代性的弔詭，我們毋寧在此稱之「風險的自由」。

參考文獻

朱元鴻

1995 〈風險知識與風險媒介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十九期，1995年6月。

周桂田

- 1994 《黑格爾的公民社會理論 ---從神學時期、耶拿時期至「法哲學原理」時期之脈絡為詮釋觀點》。台大社會系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

顧忠華，鄭文輝

- 1993 《「風險社會」之研究及其對公共政策之意涵》。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臺北。

Gehlen, A.

- 1992 何兆武 何冰 合譯，《科技時代的心靈 - 工業社會的社會心理問題》，台北：巨流。

Barber, B.

- 1995 *Starke Demokratie - Über die Teilhabe am Politischen*. Hamburg: Rotbuch Verlag.

Bauman, Z.

- 1992 *Moderne und Ambivalenz*. Fischer Verlag.

Bechmann, G.

- 1993 "Risiko als Schlüsselkategorie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ders: *Risiko und Gesellschaft - Grundlagen und Ergebnisse interdisziplinäre Risikoforschung*, Westdeutscher Verlag.

Bechmann, G & W. Rammert (Hg)

Technik und Gesellschaft, Jahrbuch 6, Campus Verlag, Frank/New York

Beck, U.

-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n andere Moderne*. Suhrkamp.

- 1990a "Der Konflikt der zwei Modernen." in: Zapf, W. (Hg),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 1990b "Vo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zur Risikogesellschaft - Überlebensfragen, Sozialstruktur und ökologische Aufklärung." in: *Umbrüche i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politische Bildung* (Hg: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S.13-36.

- 1991 "Die Soziologie und die Ökologische Frage." *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Heft 3, S.331-341.
- 1993a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Zu einer Theorie reflexiver Modernisierung*. Suhrkamp.
- 1993b "Risikogesellschaft und Vorsorgestaat - Zwischenbilanz einer Diskussion." in: F Ewald, 1993, *Der Vorsorgestaat*, Suhrkamp, S.535-58.
- 1993c "Politische Wissenstheorie der Risikogesellschaft." in: Bechmann, G(Hg), 1993, *Risiko und Gesellschaft*, Westdeutscher Verlag.
- 1996 *Weltsrisikogesellschaft und Weltbürgergesellschaft* · Manuskript erscheint im Sonderheft der KZfSS "Umweltsoziologie".
- Beck · U. & E. Beck-Gernsheim
- 1990 *Das ganz normale Chaos der Liebe*, Suhrkamp.
- Beck · U. & E. Beck-Gernsheim
- 1993 Nicht Autonomie, sondern Bastelbiographie: Anmerkungen zur Individualisierungsdiskussion am Beispiel des Aufsatzes von Günter Burkar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Jg.22, Heft 3, Juni 1993.
- Beck, U., A. Giddens, and L. Scott
- 1994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M.
- Bell, D.
- 1975 *Die nach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 Bonß, W.
- 1991 Unsicherheit und Gesellschaft - Argumente für eine soziologische Risikoforschung, *Soziale Welt*, Jrg. 42, S. 258-77.
- Böhme, G.
- 1992 *Natürlich Natur: über Natur im Zeitalter ihr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 Castoriadis, C.
- 1990 Post-modernism as generalized conformism. in Zapf, W(Hrsg.),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Verhandlungen des 2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 Douglas, M. & A. Wildavsky.
1982 *Risk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hlert, W. (Hg.)
1992 *Sozialverträgliche Technikgestaltung und/oder Technisierung von Sachzwang ?*, Westdeutscher Verlag.
- Frankenfeld, P J.
1992 Technological Citizenship: A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Risk Studie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7: 459-84.
- Forst, R.
1994 "Zivilgesellschaft und deliberative Demokratie." in ders: *Kontext der Gerechtigkeit - Politische Philosophie jenseits von Liberalismus und Kommunitarismus*, Suhrkamp.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hlen, A.
1990 Technik als Organersatz, Organentlastung, Organüberbietung, in Bekes, Peter (Hrsg.) , *Mensch und Technik*, Reclam.
- Gehlen, A.
1992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aipei, Chu Liu Book Compa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Beck, U/Giddens, A/Scott, L. 1994,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Frankfurt/M.
- Gloede, F.
1994 Technikpolitik, Technikfolgenabschätzung und Partizipation, in: Bechmann, G. & Petermann, T.(Hg.), 1994, *Interdisziplinäre Technikforschung: Genese, Folgen, Diskurs*, Frankfurt/M.: Campus, S. 147-182.
- Habermas, J.
1981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ände. Suhrkamp.
1985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Suhrkamp.

- 1991 *Die Moderne,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Stuttgart, Reclam.
- 1992 Drei normative Modelle der Demokratie: Zum Begriff deliberativer Politik, in: Münkler, H.(Hg), *Die Chancen der Freiheit. Grundprobleme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Piper Verlag, S.11-24.
- 1994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Suhrkamp.
- Halfmann, J.
- 1996 *Die gesellschaftliche "Natur" der Technik -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soziologische Theorie der Technik*, Leske + Budrich, Opladen 1996.
- Hajer, M. A.
- 1995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 Hochschild, A.
- 1990 The Need for Nurture and the Culture of Coolness: A Study of Advice Books for Women. in Zapf, W(Hrsg.),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Verhandlungen des 2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 Honneth, A.
- 1990 Pluralisierung und Anerkennung. Zum Selbstmißverständnis postmoderner Sozialtheorien. in Zapf, W(Hrsg.),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Verhandlungen des 2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 1993 *Kommunitarismus - Eine Debatte über die moralischen Grundlagen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Campus.
- Krohn, W./ Krücken, G.(Hrsg.)
- 1993 *Riskante Technologie: Reflexion und Regulation. Einführung in di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Risikoforschung*, Suhrkamp.
- Krüger, H.-D.

- 1991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und der neue Status der Wissenschaftler,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2.
- Latour, B.
-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d Artifacts, in: W. Bijker & T. Pinch (Hg.), 1992, *Shaping Technology / Building Society*, Cambridge (Mass.) S. 255-258.
- 1995 *Wir sind nie modern gewesen - Versuch einer symmetrischen Anthropologie*, Akademie Verlag, Berlin.
- Lau, C.
- 1991 Gesellschaftsdiagnose ohne Entwicklungstheorie, in: Glatzer(Hg):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 Ergänzungsband*, Frankfurt/M.
- Loo, H.& W. Reijen
- 1992 *Modernisierung*. München, dtv.
- Luhmann, N.
- 1986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Opladen.
- 1990 Risiko und Gefahr, in: ders,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5*, Opladen.
- 1990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 1991 Verstädigung über Risiken und Gefahren, in: *Die politische Meinung*, S.86.ff.
- 1991 *Soziologie des Risikos*, Berlin.
- Moscovici, S.
- 1990 *Versuch über die menschliche Geschichte der Natur*, Suhrkamp.
- Mumford, L.
- 1986 Technology and Culture, in: Donald L. Miller (Hg.), 1986, *The Lewis Mumford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S. 299-347.
- Perrow, C.
- 1988(1984) Aus d. Engl. Von Udo Rennert, Komplexität, "Kopplung und Katastrophe." in: Normale Katastrophen- *Die unvermeidbaren Risiken der Großtechnik*, Campus,

Frankfurt/M. S. 95-140.

Rammert, W.

1993 *Technik aus soziologischer Perspektive*,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5 *Soziologie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 Produkte und Probleme einer Hochtechnologie*. Campus.

Rauschenbach, T./Gängler, H. (Hg)

1992 *Soziale Arbeit und Erziehung in der Risikogesellschaft*, Neuwied.

Rehberg, K.

1990 Utopien der Stagnation. "Postmoderne" und "post-histoire" als kulturkritische Zeitdiagnosen. in Zapf, W (Hrsg.) ,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Verhandlungen des 2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Scharping, M. und Görg, C.

1994 "Natur in der Soziologie." in: Görg & M. Scharping (Hrsg), 1994,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Wiss.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S.179-201.

Schelsky, H.

1965 "Der Mensch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Zivilisation." in: Helmut Schelsky, *Auf der Suche nach der Wirklichkeit*, Düsseldorf: Diederichs, S. 439-480.

Sohn, W.

1994 "Zwischen technologischen Aufhebung der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ierung der Technologie." in: Görg, Chr. (Hg) . 1994, *Gesellschaft im Übergang -Perspektiven kritischer Soziologie*, Darmstadt.

Taylor, Charles.

1994 *Quellen des Selbst. Die Entstehung der neuzeitlichen Identität*, Suhrkamp.

Wehling, P.

1992 *Die Moderne als Sozialmythos*, Suhrkamp

Weißbach, H. & A. Poy

- 1993 *Risiken informatisierter Produktion - theoretische und empirische Ansätze, Strategien zur Risikogewältung*, Westdeutscher Verlag.
- Welsch, W.
1990 "Gesellschaft ohne Meta-Erzählung?." in Zapf, W (Hrsg.) ,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Verhandlungen des 2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 Winner, L.
1986 "Technology as Forms of Life." in: Winner,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chago Press, Chicago, S. 19-39.
- 1992 *Democracy in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Dordrecht: Kluwer.
- Zapf, W. (Hg)
1968 *Theorie sozialen Wandels*. Köln.
1991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 a.M.

Modernity and Risk Society

Kuei-Tien Chou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gitimation crisis of modernity through the sociology of risk which challenges the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sociology. Particularly,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nology, the crisis of modern society and of social ac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context. They are explicated distributively in five dimensions:

First, the dimension of value discusses the switch from the logic of line-rationality (goal-rationality) of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e logic of "reflexivity" of risk society. Second, the dimension of system indicates the monopolistic master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by which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develops optimistically and blindly. This results in a growth of "risk consciousness" of social actors. Third, the dimension of relation between the human being and nature analyses the s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tra-rela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To the contrary, it also shows that from within the risk structure which itself is threatened by the crisis, the human being, society and nature are compellingly constructed as the same living system. Fourth, th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critiques the disadvantage of technocracy and of the technological representative and emphasizes the meaning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citizenship"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discursive civil society. Fifth,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identity points out its own difficulty of decision-making for the social actors as they just confront "risk freedom".

Key Words: risk society,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social system, risk consciousness, representativ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power.